

毛泽东担任过哪些职务

□ 吴荣生



毛泽东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人们一般习惯性地尊称他为“毛主席”。然而，纵观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他还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

党成立之前担任过的“职务”

早在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积极酝酿和策划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因能力突出，毛泽东被推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这成为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个非正式职务。面对国家危亡，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以“集合同志”共同研讨救国之道为目的，组建“新民学会”，毛泽东起草了会章，并被选为干事。

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与24名青年一起离开长沙，去往北京。1918年10月，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后，毛泽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1919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自任文版股干事，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同年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毛泽东任主编，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湘江评论》被封建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接手湘

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周刊——《新湖南》的主编工作。不久，毛泽东被聘为《大公报》馆外撰述员，针砭时弊，影响较大。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联合社会各界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抵达北京后，首先成立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

在毛泽东等发起下，“湘潭教育促进会”于1920年7月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文牍干事，同时担任《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编辑主任。同年夏，毛泽东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主事，直至1922年冬。1920年9月，“长沙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正式开业，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这一年10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长沙讲演，毛泽东被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担任过的党内职务

毛泽东是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创始人之一。1921年1月，毛泽东担任新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7月，毛泽东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党的一大，并担任大会记录员。8月，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为湖南分部主任。10月，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1922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委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书记。一年后，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1926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次年4月，毛泽东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秋收起义。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不久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留在国内的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9月和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四中全会。尽管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但毛泽东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

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毛泽东为中央局委员并代理书记至1931年底。

在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1937年12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主席。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4年。1944年5月至次年4月，历时11个月之久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在党的历史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一职，仅毛泽东一人担任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中共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1976年去世。

担任过的军内职务

毛泽东在军内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井冈山会师后，起义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产生了军委，毛泽东任书记。随后，在宁冈县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因反对红军向湖南发展，毛泽东曾一度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也被取消。1928年11月初，根据中央“六月来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再次成立，毛泽东任书记。1930年2月，红四军与红五、六军及边区特委联合，成立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6月，红四、六、十二军组成红一路军，即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为政治委员。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1931年1月，在江西南都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副主席。在1932年6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之后，周恩来等人提出恢复毛泽东军内领导职务的建议，得到中央同意后，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长征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后加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此后，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中央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1月3日，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

政委。1936年3月10日，红一方面军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成为这支“先锋军”的政委。长征胜利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继续担任主席。进驻延安后，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1945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即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1954年9月，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据此，当选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又担任了国防委员会主席。

担任过的国家职务和其他职务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担任过我党早期政权的领导职务。1931年和1934年，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均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毛泽东还当选过人民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毛泽东为主任。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元首。

此外，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按照中共三大确定的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的要求，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925年9月，在参加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他参与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的修改工作，此后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蒋介石抛出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后，像毛泽东一样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



埋下“铜元”，长出新中国

——由一封电报引发的思考

□ 丁以绣

1935年，蒋介石在围追堵截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时，曾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

14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苦苦反思失败的原因。他就像开中药铺子一样，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数列出国民党军队、军人的各种缺点，反思国民党散漫、腐朽的品质，铺陈开来，颇为壮观，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国民党真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应该说，这些分析大体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归因不分主次，还是没有找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实，根本原因就隐藏在他14年前发的那封电报中。

一颗萝卜，长在土里，本不值多少钱。在无以为食时，一颗萝卜就可以延续一个生命，拔一颗萝卜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想必这颗萝卜的主人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战事一起，部队过处，百姓往往躲到他处了，面对主人不在现场的萝卜，不同性质的军队做法截然不同。共产党的军队是，每拔出一颗萝卜，就置下一块铜元；拔出多少萝卜，就置下多少铜元。大量史料告诉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用同样的方式，还取走过群众留下的稻谷，甚至牵走牲畜等，但都留下了铜元、银元，时间紧急、金钱紧缺就留下借条。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从1927年建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向群众借走了多少活命的必需品？但可以肯定，共产党军队同时又定置下不计其数铜元、银元！

1935年蒋介石在听说共产党军队秋毫无犯时，对他心里也是有所触动的，不然他不会在电报中郑重其事提到这件“小事”。但是，他也只能是提一下而已。阶级的立场决定了国共两支军队对待群众利益必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任国民党军团长的吴奇伟1936年1月23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农历除夕。询知，红军到时，只打土豪。我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颇惹人怨。”国民党从上到下，非不为，实不能为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派往各地，大搞“五子登科”，致使民怨沸腾，甚至发出“国军来了更遭殃”的慨叹，已经预示了一个政权统治的必然灭亡。国民党统治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根本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必然为全国人民所抛弃。

两相对照，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络绎不绝，甚至许多海外华侨也加入到“去延安”的行列，他们发出的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心声。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但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到了战役的第二阶段，参战兵力与中原人民支援弹药、物品的架子车比例高达1：9。人民喊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

在渡江战役中，共产党军队动员了19万余名船工，还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部队随军参战。沿途沿江人民群众说“要有人有，要船有船，要粮有粮”。有文学家讲当时的长江天险，“一苇可渡”。在无数群众面前，哪还有什么天险呢？是人民群众让我们文学家生出了革命必胜的万丈豪情——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运送军需的农民、摇船渡江的船工等等，不是共产党强征来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共产党一路走来，在地里埋下一块又一块铜元以后，慢慢长出来的。

共产党埋下铜元，就将自己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埋下的不是一块铜元，它埋下了一份秋毫无犯的宣言书，埋下了一份为了人民的责任状，埋下了一份献身人民事业的赤胆和忠贞，是子弟兵对父老乡亲无限的大爱！春华秋实，待春风吹过，共产党收获了民心，收获了同舟共济的意志，收获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收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所以，从铜元上自然生长出了一个新中国！

如今，世界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的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无不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反腐倡廉、驰而不息的显著成绩，彰显了执政为民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产党人又为人民群众置下了许许多多的“铜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样会在这些“铜元”上长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从严治党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治党方略由“整党”“管党”“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与战略深化。回顾并思考70年的治党历史，对于党引领新时代，战胜新挑战具有现实价值与借鉴意义。

从概念提出到理论体系的深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党的创立革新中尤为注重“整党”，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党的作风，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管党”与“治党”思想，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从严治党”的概念，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使用；党的十四大将这一内容写进党章实现了“管党”与“治党”从并列向并轨的转变，标志着从严治党由党建思想上升为党内大法。此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初步建构了从严治党的理论体系；十八大完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战略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纲领性发言，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鲜明主题的确立，都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确立的重要里程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断实现着治党方略的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地在“从严治党”概念前面冠以“全面”二字，赋予治党理论新的深刻内涵，将党建工作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并将“长期执政”纳入党的建设主线，直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都表明，从严治党已从概念到理论体系进而深化为战略思想。

从平行推进到立体联动的深化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在党的历史上，整风运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运动等都不断推进着党的自身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概念，构筑起“五位一体”平行推进的党建布局。党的十九大重新确立了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党的建设是统领，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呈现立体联动的态势，不仅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建设“二合一”的提法，而且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是思想建设的主基石、组织建设的关键开关、作风建设的压舱石、纪律建设的指向标、制度建设的定盘星。同时新布局首次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无论是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还是纪律建设，要想收到实效，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来，彼此配合，协同作用，合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实现党的建设从平行推进到立体联动的布局深化。

从政治核心到战斗堡垒的深化

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党的七大党章将基层党组织定位为“战斗堡垒”。十一大与十二大党章继续沿用“战斗堡垒”的定位，十四大党章增加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的基础”，使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表述更加完整。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中的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党章将“政治核心”改述为“战斗堡垒”。201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就支部工作专门制定一部主干法规，对各项工作作出清晰界定与规范。在秉承遵守党章，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基础上，条例明确规定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执政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更加复杂，而基层党组织面临的市场经济冲击更为严峻，由此产生的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现实问题需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斗争，这既是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也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深化的现实肇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即全面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实现从政治核心到战斗堡垒的功能深化。

从政治核心到战斗堡垒的深化

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党的七大党章将基层党组织定位为“战斗堡垒”。十一大与十二大党章继续沿用“战斗堡垒”的定位，十四大党章增加了党的基层组织

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深化』

□ 岳春宇

“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的基础”，使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表述更加完整。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中的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党章将“政治核心”改述为“战斗堡垒”。201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就支部工作专门制定一部主干法规，对各项工作作出清晰界定与规范。在秉承遵守党章，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基础上，条例明确规定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执政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更加复杂，而基层党组织面临的市场经济冲击更为严峻，由此产生的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现实问题需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斗争，这既是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也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深化的现实肇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即全面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实现从政治核心到战斗堡垒的功能深化。

从各有倚重到同向发力的深化

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在实际运行中，我们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曾有倚重，如古田会议后强化思想建党，改革开放后则偏重制度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为注重二者同向发力的成效叠加，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一论断强调“思想建党制度化”与“制度治党思想化”相结合，不仅厘清了二者的辩证关系，而且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规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在目标上同心同行，方向一致；在功能上刚柔并济，凹凸互补。思想建党需要制度治党的长效稳固，制度治党需要思想建党的规范指引。二者的同向发力成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路径与新探索。确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不仅是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一体两翼”模式的需要，更是打造全面从严治党支撑体系的需要。

